

● 中国古代史

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

何 德 章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何德章(1965-),男,四川南部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摘 要] 拓跋鲜卑建立过中国历史上的北魏王朝,此前近一个世纪中,鲜卑拓跋部在幽并边地汉族士人的影响下,改变其旧的部落形态,向中原传统的专制政权体制转变,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鲜卑代国时期的历史进步是拓跋鲜卑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并为后来北魏的历史过程定下了发展的基调。

[关键词] 拓跋鲜卑;鲜卑代国;汉化;幽并士人

[中图分类号] K 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1-0051-11

一、幽并士人与鲜卑代国的建立

《魏书》卷113《官氏志》:北魏道武帝天赐四年(公元407年),“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内诏命,取八国良家,代郡、上谷、广宁、雁门四郡中年长有器望者充之。”“八国”指当时分布在魏都平城周围由八部大人管理的鲜卑族人,他们作为“国之肺腑”,是当时北魏统治的核心力量;平城附近的四郡较早进入拓跋政治影响范围内,四郡汉族士人为早期拓跋政权的建立和成长立过功,所以能享受与鲜卑“国人”相似的政治待遇。西晋时,代郡、上谷、广宁三郡属幽州,雁门属并州。故文中称此四郡汉族士人为“幽并士人”。

自匈奴败亡,鲜卑各部逐渐移徙漠北,散居畜牧。当东汉桓帝时,鲜卑檀石槐征服草原各部,“尽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分之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主领之”。从此,鲜卑各部“大人”由原来的推举产生变为“世相传袭”^[1](卷90,乌桓鲜卑传)。檀石槐成为草原霸主后,据称他傲慢地拒绝了东汉朝廷封授的“王”的名号,有人认为他此时可能已采称“可汗”,即“由天来授予神圣权威统治天下的、唯一的最高主权者”^[2](第100页)。

正当檀石槐时,源出大兴安岭东麓的鲜卑拓跋部经“山高谷深,九难八阻”,迁居漠北草原^①,并与当地高车、匈奴诸部融合,势力大增。《魏书》卷1《序纪》称拓跋首领献帝邻“年衰老,乃以位授子”,与同一时期鲜卑各部首领“世相传袭”的背景相符。同《纪》称邻“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计有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又以其叔父之后为乙旌氏,疏属为车焜氏,“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上述九氏,合拓跋部为“十姓”,实际上构成以拓跋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其中纥骨氏和乙旌氏本为高车部落,普氏与匈奴卜氏颇有渊源^②,这说明拓跋鲜卑很早便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本文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拓跋鲜卑”这个概念的。

拓跋邻及其子诘汾率拓跋部进入漠北以后,受西部鲜卑部落的打击,部落联盟解体。诘汾子力微沦为没鹿回部大人奚宾的扈从,及从战有功,奚宾嫁之以女,遂自率一部居长川,历时10余年,“诸部旧民咸来归附”,公元248年,力微杀奚宾二子,并其部落,“诸部大人,悉皆款附,控弦上马二十余万”。见于《魏书·序纪》。

公元258年,拓跋力微立庭于阴山南麓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城西10公里上土城村),号令诸部。《资治通鉴》西晋武帝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十二月条称力微为“可汗”,胡三省注称:“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倘若有据,其时力微已采用驾御诸部大人的最高称号。力微对中原的曹魏政权采取和平策略,遣子沙漠汗入质于洛阳。据《序纪》,拓跋部与曹魏之间“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沙漠汗居洛经历魏晋禅代,前后达14年之久,“风采被服,同于南夏”,诸部大人惧其继为可汗后“变易旧俗”,又经晋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卫瓘离间,杀沙漠汗于北返途中。鲜卑拓跋部未能在沙漠汗的率领下迅速走上汉化的道路,却在幽并士人的影响下,缓慢地步入汉化之途。

拓跋力微死后,塞北诸部经10余年扰乱,复为力微子拓跋禄官统一。约在公元295年,禄官袭檀石槐故事,“分国为三部”,自总一部居上谷北,沙漠汗一子拓跋猗廋总一部居代郡参合破,另一子拓跋猗卢总一部居盛乐。猗卢击晋并州,徙杂胡部落于其所统云中、五原、朔方等地,复击河套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3](卷1,序纪)。拓跋鲜卑逼居塞表,不仅受到当地汉代以来农耕生活的影响,渐知粒食,而且为其进一步与中原政权接触,招徕幽并士人创造了条件。

其时,西晋已处惠帝政乱朝危之秋,晋室出镇宗王和地方势力人物纷纷培养自己的势力,各为自安之计,拉拢少数族首领。如幽州刺史王浚将二女分别嫁辽东鲜卑首领勿尘、苏恕延;成都王司马颖络匈奴刘渊。结果使辽东鲜卑和并州五部匈奴参与西晋政争,为五胡之乱张本。

雄踞塞北的鲜卑拓跋部亦成为各方势力拉拢的目标。《魏书·序纪》称:拓跋禄官二年(公元296年),“葬文帝(沙漠汗)及皇后封氏,……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同书卷13《文帝皇后封氏传》记:“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者二十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应是《序纪》的依据。晋室三方藩镇遣使吊唁,于拓跋部必为盛事,当时记于石铭,足见《序纪》所述为事实。时司马颖为平北将军,镇邺城;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长安;司马腾为宁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驻晋阳。三人于朝廷昏庸、乱事遍起之时行境外之交,目的不言自明。

及八王乱炽,司马颖之党匈奴刘渊以助颖为名,率匈奴五部起兵于离石,司马腾借师于拓跋部,猗廋率10余万骑,拓跋禄官亦同举兵,“大破渊众于河西、上党”。次年,司马腾受刘渊攻击,复求助于拓跋部,猗廋以“轻骑数千救之”。事后,“晋假桓帝(即猗廋)大单于,金印紫绶。”并见于《序纪》。1956年秋,于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一批鲜卑文物,中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及“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各一枚,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金牌饰物,上阴刻“猗廋金”3个汉字,可见“金印紫绶”之说并非虚语。唯其时西晋怀帝辗转流移于长安、邠城间,其事当出司马腾之意,故以“假”为辞。

司马颖虽亦曾联络拓跋部,猗廋等却弃之而助司马腾,腾处并州,与拓跋部地域相近,自然是原因之一,代人卫操等构合其间却是更重要的原因。

《魏书》卷23《卫操传》:操为代郡人,曾为晋征北将军、幽州刺史卫瓘牙门将,“数使于国,颇自结附。始祖(力微)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及刘渊、石勒之乱,劝桓帝匡助晋室。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表加将号,稍迁至右将军,封定襄侯。”传中所称卫雄,本亦为晋“州从事”,与卫操同入猗廋麾下的卫氏“宗室”还有卫瓘、卫崇、卫清、卫仪等;“乡亲”则有段繁、范班等7人。据《卫操传》所载操为猗卢所撰纪功碑文。司马腾求师拓跋部时,所遣使人有义阳亭侯卫谟及协义亭侯卫鞅,二人与卫操当属同族。碑文称卫操、卫雄接到来使后,“承命会议,谘论奋发”,以“昔桓文匡佐,功著周室。显名载籍,列赏备物”,劝说猗卢兄弟,促他们出兵助司马腾。碑文指责司马颖“敢逼天王,兵甲屡起。怙众肆暴,虐用将士”,且招引匈

奴“暴类”,弃亲求疏;称司马腾“才神绝世,规略超远。……爱命外国,引军内备”;卫操等入拓跋部后,其宗亲卫漠等仍得为司马腾部属,后又承司马腾之命入拓跋部促猗柁等起兵,“奉戴天王”^⑧。卫操在纪功碑文中对司马颖的指斥及对司马腾的称颂等事实,在表明卫操等入拓跋部,并非为边人欲挟外族以邀私利,而是受司马腾指踪,负有为司马腾联络拓跋部的使命。卫操等投拓跋部、拓跋鲜卑支持司马腾抗击刘渊,都是八王之乱的插曲。

公元305年及307年,拓跋猗柁、拓跋禄官先后去世,拓跋猗卢将三部全部纳入自己麾下。继司马腾为并州刺史刘琨,遵用司马腾联络鲜卑拓跋部抗击刘渊、石勒的策略。公元310年,遣使至拓跋部,以其子刘遵为人质,并假猗卢为大单于、代公,割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数百里地为之“封邑”。次年,又表上晋怀帝,正式授予猗卢代公的封号。公元315年,晋惠帝又封猗卢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亦见于《序纪》。鲜卑代国正式建立,这是拓跋鲜卑在卫操等汉族士人影响下参与中原政争的结果。

幽并士人在鲜卑代国的建立中起着重要作用。《魏书》卷23《莫含传》:莫含为雁门繁峙人,“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代)国中。穆帝(猗卢)爱其才器,善待之。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于琨。……甚为穆帝所重,常参军国大谋。卒于左将军、关中侯。”莫含的经历,可以说就是卫操的经历,卫操等入猗卢麾下,或也与猗卢之请有关。卫操、莫含等幽并汉族主人进入鲜卑拓跋部,使拓跋部支持司马越党司马腾、刘琨抗击匈奴、羯石,影响到东晋初年的外交政策^[4](第27—37页),也使拓跋鲜卑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首先,鲜卑拓跋首领接受了中原王朝“王”的封号。在此以前,拓跋首领有称“可汗”的迹象,已见前述,同时也有受匈奴影响称“单于”的可能。《晋书·刘琨传》即称猗柁为“单于”,这也许是司马腾“假”猗柁为“大单于”于前,刘琨又“假”猗卢为“大单于”于后的原因。拓跋猗卢最终还是接受了代王之号,并按中原王国官制,“备置官属”。其后,什翼犍、拓跋珪都曾以“代王”相号召,建立相应的制度。猗卢称代王,可说是鲜卑代国创建之始。

其次,拓跋鲜卑历史上出现了与原大人系列通不相同的汉名官职。《魏书·官氏志》称:“魏氏世居云朔,远统不(?)臣,掌事立司,各有号秩。及交好南夏,颇亦改创。”卫操、卫雄入拓跋部后,甚受猗柁“礼重”,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卫操死后,姬澹又与卫雄为“左右辅相”。事见《卫操传》及附传。前述司马腾曾表卫操为将,“稍迁至右将军、封定襄侯”。猗柁又表列卫雄、姬澹“勋效”,“皆拜将军”。《卫操传》列晋末入鲜卑代国之幽并士人的封爵有:

卫雄	左将军	云中侯	姬澹	信义将军	楼烦侯
莫含	左将军	关中侯	卫泥	信义将军	都亭侯
段繁	信义将军	都亭侯	王发	建武将军	都亭侯
贾庆	建武将军	上洛亭侯	范班	折冲将军	广武亭侯
卫懋		安乐亭侯	卫崇		都亭侯
卫清		都亭侯	贾循		都亭侯
李登		关中侯	郭乳		关内侯

亭侯、都亭侯、关内侯、关中侯等,名号不同,从卫操、卫雄等将军号由升迁而至看,应作为一种升迁序列。《通典·职官十三》引《晋令》:“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上述代国创建及建立后所授爵位,仍从晋制,且无公爵,表明属于王国官制。这些由王权予夺的中原王朝特有的官职爵号,与“世相传袭”的大人及“大人以下,各自有畜牧治产,不相徭役”的鲜卑旧习不同,是拓跋王权成长的重要标志。

其三,幽并士人进入拓跋部,使拓跋首领受到汉族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卫操于代“展其文谋”;莫含从猗卢之请入代国,无疑因“刻木为信”的鲜卑统治者在建立王权的过程中,需要利用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素养所致。卫操等也积极以汉族传统的文化观念影响拓跋首领,他们以桓文匡辅周室而“显名载籍,列赏

备物”,敦促猗卢兄弟起兵助司马腾,在后来的纪功碑铭中又反复称颂猗卢等“奉承晋皇,捍御边疆”,“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弃家忧国,以危为安”,“忠孝自然”,“忠于晋室”,“垂名金石,载美晋书”。猗卢死后,被谥为“义烈”。这无疑为随后猗卢接受西晋朝廷“代王”的封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卫操等还向猗卢等灌输鲜卑、汉族同源的观念,在纪功碑称他们是“轩辕之苗裔”,这与日后拓跋鲜卑自称黄帝后裔颇有关系。

其四,幽并士人进入拓跋部,增强了拓跋首领的势力,促使其由部落联盟首领向专制君主转变。幽并士人入拓跋部,多将宗亲家室以从,且受幽并骑战习俗影响,皆骁勇善战。如卫雄、姬澹为猗卢左右辅相,猗卢“壮其膂力,并以为将,常随征发,大著威名”^[3](卷23,卫操传卫雄附传)。从诸人多有将号看,他们已成为代王统率下一支影响塞北政治格局的重要势力,以至被“旧人”嫉恨。代王猗卢既得到他们在“文谋”和武力两方面的支持,便试图以“明刑峻法”,即以明白而严厉的法律条文来保持自己的权力。在此以前,拓跋首领对其部民,“以言语约束,刻契纪事,无罔圉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3](卷111,刑罚志)。这显然已不足以显示代王的日益增长的权威。

受中原汉族政权影响而出现的代国及相应的王国官属,与草原上原有的部落联盟,无疑是一个对立的事物,正是前者促使拓跋王权在接受汉文化因素后不断成长,最后超越部落大人势力,上升为专制皇权。部落联盟体制内包含一个必将取而代之的王官系统,成为拓跋鲜卑历史上胡汉杂糅体制的最初形态,汉化与反汉化的斗争就此展开。

据《魏书·卫操传卫雄附传》,代王猗卢在“新人”支持下,制定法律,强化新兴的王权,不仅造成“国落骚骇”的后果,也激发了部落大人与幽并士人的矛盾,“欲尽杀之”。因此,公元316年,鲜卑代国仅存在1年后,猗卢被杀,卫雄、姬澹等失去依靠,率数万人南奔刘琨。

这次“新旧”势力之争,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代表在塞北草原的交战,守旧的鲜卑部落大人获胜,新生的拓跋王权被扼杀,幽并士人退出拓跋部,鲜卑拓跋部刚开始的汉化进程宣告中止。猗卢死后,部落大人忙于内部权力争夺,无暇顾及中原局势,继猗卢后的拓跋郁律在“绥集流散”的同时,放弃了猗卢尊尚晋室,联合遗晋势力抗击刘、石的策略。公元317年,刘琨及鲜卑段部、鲜卑慕容部首领联名向司马睿劝进,鲜卑拓跋部未与其事。据《序纪》,公元320年,东晋遣韩畅出使拓跋部,为拓跋郁律“加崇爵服”,遭到拒绝。拓跋首领放弃了代王称号,这与同时慕容部力求得东晋的封号大相径庭。拓跋郁律旋即被猗卢之妻杀死,“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拓跋鲜卑因此丧失了一次历史提供的机会。

二、什翼犍与鲜卑代国的重建

拓跋郁律被杀后近20年中,塞北诸部一直扰攘不定。猗卢子贺偃在其母支持下掌权后,“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其后,贺偃弟“炀皇帝”纥那与郁律子“烈皇帝”翳槐在诸部大人及中原石赵、辽东慕容鲜卑的操纵下,相互争逐,“国”无宁日。据《魏书·序纪》,公元337年,翳槐临死前,把重新统一塞北各部的希望寄托给其弟什翼犍,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

什翼犍不到10岁出居襄国为人质,至此已历10年,在塞北无多大势力可言。翳槐中意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翳槐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要在塞北维持稳定的权力,须有大国的支持。公元328年,翳槐执掌权柄,便遣什翼犍去石赵为人质以自重。《序纪》称:公元334年,因贺兰都首领“不修臣职”而杀之,诸部大人复拥前此出奔宇文部的“炀皇帝”纥那,翳槐逃亡邺城,“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公元336年,石虎遣李穆率五千骑送之还塞北,纥那复奔慕容部。其时,影响塞北形势的除部落大人外,就是慕容鲜卑和石赵政权。什翼犍有石赵的支持,可以排除部落大人的阻挠,也有能力抵御来自辽东慕容部的威胁。其二,什翼犍幼年出居中原,历时10年,时石赵政权拉拢汉族人士,行九品选举之制,设立学校,文化颇有可观,这对年轻的什翼犍不会没有影响。《魏书》卷114《释老志》称:“昭成至襄国,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对汉族文化他当不生疏。而且,石赵政权控制臣民的办法也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翳槐被逐至邺城时,很有可能与什翼犍讨论过塞北形势,探讨过控御各部的办法,从而认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什翼犍必能改变鲜卑各部各自为政的局面。

翳槐的建议受到部落大人的反对。《魏书》卷14《高凉王孤传》:“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内外未安,昭成(什翼犍)在南,来未可果,比至之间,恐生变诈,宜立长君以镇众望。次弟屈,刚猛多变,不如孤之宽和柔顺,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共推孤。”拓跋郁律诸子,翳槐居长,什翼犍次之,时年19,拓跋屈再次之,拓跋孤最幼。部落大人以“立长君以镇众望”为借口,却杀年长而“刚猛多变”的拓跋屈,推年幼且“柔和宽顺”的拓跋孤。显然,他们担心年长且久居南夏的什翼犍回到塞北后,将“变易旧俗”,损害自己固有的权利。

《宋书》卷95《索虏传》:“(猗)卢死,子又幼弱,卢孙(按:据《序纪》,什翼犍为猗卢侄孙)什翼犍勇壮,众复附之,号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南齐书》卷57《魏虏传》称:“猗卢孙什翼犍,字郁律旃,后还阴山为单于,领匈奴诸部。”《宋书》所称“上洛公”,当是什翼犍所受石赵封爵。《南齐书》所称“单于”,则应是什翼犍作为部落联盟首领拥有的名号。什翼犍得继续统诸部,据前引《魏书·高凉王孤传》,为孤以什翼犍年长当立,“乃自诣邺奉迎,请身留为质,石虎义而从之”。什翼犍能顺利地返回塞北,取代幼弟,没有像其曾祖沙漠汗那样,被部落大人杀于归途,无疑与石赵的支持有关系。受过中原文明熏陶的什翼犍,对塞北鲜卑各部的历史进程起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338年,什翼犍回到塞北,成为拓跋部落联盟的首领,“为单于”,同时,又承袭了“代王”的封号,“始置百官,分掌众职”,重建猗卢为代王时一度仿晋制而设立的王官制度。《魏书·官氏志》称:“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风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公元339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什翼犍竭力增强代王的威权,利用听命于自己的以左长史、郎中令为首的王国官属,实现对各部落的控制;另外,通过由自己任命的南、北二部大人控制新归附者,形成代王直接指挥的人众。随着以后30余年中对漠北高车、柔然诸族的连续攻击,王权所能控制的人口大大增加。

曾促使鲜卑代国诞生的幽并士人在什翼犍重建的代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书》卷24《许谦传》称许谦为代郡人,“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与燕风授献明帝经”。什翼犍初返塞北,闻代郡人燕风“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使人以礼迎致之,风不应聘,乃命诸军围代城,谓城人曰:‘燕风不来,吾将屠汝!’代人惧,送风。昭成与语,大说,待以宾礼。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又以经授献明帝”^[3](卷24,燕风传)莫含子莫显亦出任代王左常侍。《魏书》卷28《李栗传》:栗为雁门人,“昭成时,父祖入国。”什翼犍重建代国。必然要拉拢幽并士人,因为代国王官作为一个控制塞北诸部的机构,需要有文化的人来掌管文记,处理政事。仅以言语约束或刻木之契难以将各部有效地控制在代王手中。因此,什翼犍不惜以兵威取得燕风的归顺,并让儿子拓跋寔学习儒家经典。

什翼犍将自己称代王的当年定为“建国”元年,这是拓跋鲜卑第一次采用中原王朝的纪年方式。他还试图改变祖先游牧迁徙的习俗,于建国二年(公元339年)集诸部大人,议定都于湟源川(今山西山阴县境),受阻不成,而次年遂又迁居云中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终于使这里成为拓跋部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中心。自从建国十八年(公元355年)什翼犍将其祖母平文后王氏葬于此地后,盛乐金陵一直是孝文帝以前拓跋首领及北魏诸帝、帝后的归安之所。什翼犍还使部落大人接受了不太严厉的法律。《魏书》卷111《刑罚志》云:“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者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对“大逆”罪行的惩罚特别严厉,表明什翼犍加强王权的企图。

什翼犍尽管重建了代国,但并没有冲破部落联盟体制,实现王权对部落势力的绝对控制。《魏书·序纪》记建国十四年(公元351年),冉闵事起,什翼犍欲乘机进军中原,命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因“诸大人”阻挠而止。诸部大人仍“世相传袭”,各统部落,代王什翼犍发动对外战争,需经各部大人许可。

《魏书》卷83上《外戚·贺讷传》:什翼犍孙拓跋珪在代国灭亡后,逃奔其母所属贺兰部,后诸部大人请贺讷兄弟推珪为主,贺讷之弟贺染干说:“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贺讷反驳他说:“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常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臣节”之语,固属史官修饰之辞,事情的真相是:拓跋部为“国”,贺兰部亦为“国”,只因拓跋部处盟主地位,故有“大国”之称,但对于贺兰部之“国”并无绝对的权力。公元376年,苻秦举兵击代,什翼犍先遣白部、独孤部御敌,被击败,复遣南部大人刘库仁迎战,又大败,遂率“国人”(实际上是拓跋本部人)北走阴山,原归附拓跋部的高车诸部乘势攻之,拥有数十万骑兵的拓跋部落联盟迅速败亡。究其原因,实因塞北诸部各自为政,未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所致。这种状况也使什翼犍时期的鲜卑代国虽貌似强大,“东自涉貊,西及破落那,北尽沙漠,率皆归服,有众数十万人”^[5],却长期处于中原政权的附庸地位。

什翼犍从邺城回到阴山时,留其弟拓跋孤为人质,代、赵之间相安无事。称代王后,为了消除辽东日渐强大的慕容政权的威胁,防止其挟纆那以袭拓跋部,于建国二年(公元339年)娶慕容皝之妹为妻。建国四年(公元341年),慕容氏死,皝又妻以宗女。建国七年(公元344年),什翼犍复改娶慕容皝之女为妻,此即《魏书·皇后列传》所记昭成慕容皇后,拓跋珪之祖母。同年,什翼犍又献其长兄翳槐之女于慕容皝。慕容燕国兼并中原,迁都邺城后,代、燕之间仍通婚不绝。备见《魏书·序纪》。

《晋书》卷110《慕容倝载记》:燕光寿元年(代建国二十年,公元357年),“遣其抚军慕容垂、中军慕容虔与护军平熙等率步骑8万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余万级,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余万。”燕出动八万大军出击敕勒于塞北,必须越过横跨阴山南北数千里地的代国,此足见代国实际处于慕容燕附庸的地位。《慕容倝载记》又称:“塞北七国贺兰、涉勒等皆降。”《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燕录》系其事于光寿三年(公元359年)三月,贺兰部本属拓跋部落联盟中的成员,转而归降慕容燕,亦表明拓跋部对塞北诸部控制力极弱。

前燕末,燕、代之间的关系由于鲜卑代国的反抗而破裂。《通鉴》东晋太和二年(代建国三十年,公元367年)七月:“燕下邳王厉等破敕勒,获马、牛数万头。初,厉兵过代地,犯其稼田,代王什翼犍怒。燕平北将军武强公丕以幽州兵戍云中。八月,什翼犍攻云中,丕弃城走,震威将军慕容廆卒战没。”慕容燕驻兵云中,对拓跋代国起着监视作用。什翼犍逐前燕戍兵的上一年,曾遣左长史燕凤出使关中前秦,显然与这次事件有关。由于前燕内部政治混乱,且已面临前秦的进攻,未能对代国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独立后的代国还未来得及稳定的控制塞北诸部,便于公元376年在前秦的攻击下灭亡。

三、从代王到皇帝

公元383年,前秦兵败淝水,慕容余众从关中东奔河北,形成后燕、西燕两相对峙的政权,关陇各族纷纷割据一隅,称雄当地,为鲜卑代国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公元386年正月,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为各部所推,举行祭天大典,建元登国,鲜卑代国又一次复兴。

什翼犍的代国灭亡后,拓跋珪曾流落中原近10年,《南齐书·魏虏传》称他“颇有学问,好天文”,应与这一段经历有关。也正是这种经历,使他最终率领拓跋部走向中原^[6](第17—36页)。

当拓跋珪回到塞北时,上谷侯岌、张衮及代郡许谦等幽并士人又纷纷投奔拓跋部,见于《魏书》卷15《拓跋珪传》。拓跋珪为代王,以什翼犍时代曾为代王郎中令的许谦为右司马,以张衮为左长史,“参赞初基”。燕凤也再次出任代王属官。他们积极支持拓跋珪统一诸部的活动,并鼓励他不失时机的进军中原。《魏书》卷24《张衮传》:张衮为上谷沮阳人,祖张翼曾为辽东太守、父张卓为昌黎太守,大致是慕容前燕时官职。张衮本人曾任郡五官掾,“好学,有文才。太祖为代王,选为左长史。……衮常参大谋,决策帷幄,太祖器之,礼遇优厚。衮每告人曰:‘昔乐毅杖策于燕昭,公达委身于魏武,盖命世难可期,千载不易遇。主上天姿杰迈,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风云之会,不建腾跃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质,竭诚服事。”同书卷88《良吏·张恂传》称恂“随兄衮归国,参代王军事。恂言于太祖曰:‘金运(案:指

西晋)失御,刘、石纷纭,慕容窃号山东,苻、姚盗器秦陇。……今中土遗民,望云冀润,宜因斯会,以建大业。’太祖深器异,厚加礼焉”。

从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到登国六年(公元391年),拓跋珪在后燕政权的帮助下,征服了阴山以北鲜卑各部及柔然、高车一些部落。使代国政治影响及于阴山南北。登国六年(公元391年)6月,曾与拓跋珪协同作战的后燕将领慕容贺麟攻贺兰部,拓跋珪率军救护,与后燕发生冲突。燕主、拓跋珪舅公慕容垂留珪同母弟拓跋觚于燕都中山(今河北定县),要挟代国贡献“名马”。拓跋珪遂与后燕绝交,转与都于长子(今山西长子)的西燕联合。同年12月,大败刘卫辰,“自河以南(今河套地区),诸部悉平”^[3](卷2,太祖纪)。恢复了什翼犍时期代国的势力范围。登国十一年(公元396年)11月,代军又大败后燕来犯之众于参合陂,中原地区已没有力量能同代国抗衡,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拓跋珪所以能在短短10年间创下如此功业,乃因他成功地战胜了部落势力,将诸部完全置于代王的直接控制之下。

拓跋珪借以控制诸部的是他在登国年间组织起来的强大的近卫亲军。《魏书·官氏志》:登国元年(公元386年),“置内侍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以下,中散以上,皆统之。”同书卷29《奚斤传》:“登国初,与长孙肥等俱统禁兵。后以斤为侍郎,亲近左右。从破慕容宝于参合。皇始初,从征中原,以斤为征东长史,拜越骑校尉,典宿卫禁旅。”卷26《长孙肥传》:“昭成时,年十三,以选内侍。太祖之在独孤及贺兰部,肥常侍从,御侮左右,太祖深信仗之。登国初,与莫题等俱为大将……后从征中山,拜中领军将军。”卷27《穆崇传穆丑善附传》:“太祖初,率部归附,与崇同心戮力,御侮左右。”卷28《李栗传》:“时王业草创,爪牙腹心,多任亲近,唯栗一介远寄,兼非戚旧,当世荣之。数有战功,拜左军将军。太祖征慕容宝,栗督5万骑为前驱。”李栗为雁门人,无部落之众可以依凭,皇始初能率五万骑进入中原,足见拓跋珪已控制了一支直属自己的强大武装,勿需如其祖什翼犍那样,仰仗部落大人。《魏书·太祖纪》: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后燕太子慕容宝率军攻代,“帝亲泊兵于河南。……是时,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元遵为拓跋珪叔父寿鸠之子,元虔为其叔纥根之子,元仪为其同母弟。拓跋珪通过心腹戚旧控制着强大的军队,这支在兼并各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代王亲军,成为拓跋珪离散诸部,由代王到皇帝,完全打破部落联盟体制的势力基础。

代王亲军对促成、巩固王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魏书》卷28《莫题传》:“初为幢将,领禁兵。太祖之征慕容宝也。宝夜来犯营,军人惊骇,遂有亡还京师者,言官军败于柏肆,京师不安。南安公元顺因之欲摄国事。题谓顺曰:‘此大事,不可轻尔,宜审待后要,不然,祸将及矣。’顺乃止。”这是禁军将领莫题在盛乐成功地阻止了一场政变密谋。《太祖纪》称拓跋珪进军中原时,“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及在柏肆坞受慕容宝夜袭,“兵人骇散”,珪“跳出击鼓,俄而左右及中军将上稍稍来集。……宝众大败”。拓跋珪败而能整,亦赖左右及中军强大。《太祖纪》又称:拓跋珪久围中山不下,“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十四五。’……群下咸思还北。帝知其意,因谓之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拓跋珪所以能率鲜卑拓跋部走进中原,实现拓跋猗卢及什翼犍未能实现的梦想。正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其祖先未能建立的禁卫亲军,使他可以驾驭诸部大人,用不着再仰赖他们的“民”,即部落大人统率的部落成员。

柔然和高车等大漠游牧部落方面的情况足以说明拓跋珪组建禁卫亲军对代国成长所起的作用。《魏书》卷103《蠕蠕传》:拓跋珪创业之时,柔然在其首领匹侯跋及缊纥提统率下,游牧于漠北和漠南草原。登国六年(公元391年)10月,拓跋珪率军攻击,匹侯跋等降附。登国九年(公元394年),缊纥提子社仑率柔然一部远走漠北,“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置幢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撻。”遂并漠北高车及匈奴余部,迅速建立起一个“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翰海,南则临大碛”的草原帝国,社仑因号丘豆伐可汗(汉语意为“驾驭开张的皇帝”)。柔然遂成为日后北魏政权北边强敌。拓跋珪后来曾感慨地说:“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抄掠,驾犂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犂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

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阵,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社仑“学中国”,立军幢,实际上就是采用其对手拓跋珪接受中原文明而创立的制度。如果站在中原慕容后燕政权的立场上,借用拓跋珪对柔然兴起的感叹,拓跋珪可说是拓跋鲜卑的“圣人”,中原各族政权的“大盗”。

与柔然“学中国”相反,高车诸部“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阵,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3](卷 103,高车传),破遂难以抵御柔然和拓跋政权的进攻,或役属于柔然,或被拓跋珪迁至阴山南北地区,成为拓跋政权的重要兵源。

由于代王拥有一支亲自指挥的强大的军队,拓跋珪便逐渐由部落联盟首领向专制国王转变,“世相传袭”的部落大人逐渐屈从于王权,成为国王可以予夺的官职,这表现在外朝大人的设立上。

《魏书·官氏志》:登国元年,置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据同书卷 29《叔孙建传》,外朝大人有 13 人,“迭典庶事,参军国大谋”。确知为外朝大人者还有和跋、庾业延、王建、安同,他们不仅奉代王命出使,传宣命令,还“参预军国”、“参军国大谋”,实际上是代王属下的一个决策机构。

更重要的是,“大人”成了一种由代王拜授升迁的官职。登国元年,拓跋珪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据《魏书》卷 25《长孙嵩传》,嵩父在什翼犍时为南部大人,嵩“年十四,代父统军”,代国灭于前秦时,“率部众”投刘库仁。长孙嵩“代父统军”,应即代为南部大人。《太祖纪》篇首即称“南部大人”长孙嵩将部民依刘库仁,可以为证。因此,拓跋珪初为代王,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反映了部落大人“世相传袭”的旧制,叔孙普洛当亦如是。登国元年(公元 386 年)十月,叔孙普洛亡奔刘卫辰,拓跋珪以贺狄干代之。《魏书》卷 28《贺狄干传》:“家本小族,世忠厚,为将以平当称,稍迁北部大人。登国初,与长孙嵩为对,明于听察,为人爱敬。”同书卷 83 上《外戚·刘罗辰传》称罗辰本北部大人刘眷之后,登国时,以功“拜南部大人”,则长孙嵩不久亦被刘罗辰取代。登国中,还出现了由代王授予的“大人”名号。《魏书》卷 27《穆崇传穆丑善附传》:丑善于登国初有功,“拜天部大人,居于东藩。”卷 30《刘尼传》:“曾祖敦,有功于太祖,为方面大人。”同卷《王建传》称建本被任命为外朝大人,登国中,因功迁中部大人。原来世袭的部落大人成为代王属官,没有部落名号而以南、北、中等方位词命名的大人,所统当是不断被拓跋珪征服的各部落的部众,其间就当经历了各部分并离合的过程,这应是拓跋珪“离散诸部”的重要内容之一。

拓跋珪称代王后,曾按汉制封其功臣。如元仪先封九原公,后改平原公,再改为东平公;元遵为略阳公;元虔为陈留公;元顺为南安公。均见于《魏书》各人本传。同书卷 33《张济传》称济父张千秋在西燕亡后奔代国,“太祖善之,拜建节将军,赐爵成纪侯,随从征伐,累著功绩。登国末卒”。这表明登国时亦有公、侯、将军等汉名官爵,与鲜卑大人等名号并存,呈现出两种制度杂糅的特征。随着代国王官系统突破部落联盟体制,成为塞北绝对的权力中心,也随着鲜卑代国摆脱中原政权的控制,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拓跋珪需要用更为完善的制度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也需要比“王”更高的名号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新兴政权的奠基需要大量的文化人,面临为拓跋政权设计一个完善的政治制度的任务,曾经为拓跋政权的成长做出贡献的幽并边地士人开始显得力不从心。《魏书·太祖纪》:登国十年(公元 395 年)十一月,拓跋珪大败后燕军于参合破,“于俘虏之中把其才识者贾彝、贾润、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据同书卷 33《贾彝传》,拓跋珪事先曾遣使求彝于慕容垂而不得,现在终于如愿以偿。由于有新获的中原士人参与制定“宪章”,次年七月,“右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进旌旗,出入警蹕。于是改元。”是为皇始元年。拓跋珪终于成为拓跋鲜卑第一个皇帝。同年八月,拓跋珪率军攻后燕并州,九月攻占晋阳。《太祖纪》称:“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指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这样,又有不少“士大夫”进入拓跋政权,为拓跋珪进一步按汉制组建政权提供了条件。同月,“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与此同时,拓跋政权还按中原政权的作法,设置太学以教育贵族子弟。《魏书》卷 84《儒林·梁越传》:“国初为礼经博士。”同书卷 33《薛提传》:“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儒林传序》所说不虚,此时太学生员竟千有余人。

从拓跋猗卢称代王到拓跋珪称皇帝,其间经过了 90 余年,由于汉族文明的影响,主要由于幽并数代士

人的活动,拓跋鲜卑在进入中原以前,业已按中原政权的形式建立起国家机构,这为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进一步改造自己,接受汉族文明的洗礼,并最终与汉族融为一体,创造了条件。

四、余 论

鲜卑代国成长的历史表明,拓跋政权建立发展的过程,实际就是按汉族文化理念对原有部落组织进行不断改造的过程。从部落首领到代王,再到皇帝;从王国官制到建立台省;从部落大人世代传袭到设官分职;从言语约束到刑法而治,再到创置太学,无一不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者多注意其族源流变及拓跋政权成长与封建化的关系,于汉文化在拓跋政权成长过程中的作用鲜加论述,视鲜卑代国成长过程为拓跋鲜卑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就拓跋鲜卑与其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柔然、高车诸族不同的发展结果来看,正是汉文化促进了鲜卑代国的成长,使拓跋鲜卑迅速超越了柔然、高车的发展水平。在拓跋鲜卑汉化这一最初阶段,幽并汉族士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拓跋统治者什翼犍、拓跋珪均曾游历中原,接受过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执政后,引用幽并士人,使按中原政权形式组建的鲜卑代国两度复兴,冲破部落联盟体制的母胎,并促使拓跋王权向专制皇权转化,也是拓跋政权不断汉化的重要原因。

鲜卑代国成长的历史还表明,拓跋王权在汉文化影响下寻求自身发展,必然损害部落首领的利益,从拓跋猗卢称代王到拓跋珪称皇帝,鲜卑代国的历史数次中断,均由于部落大人在其间兴风作浪。拓跋珪称帝,标志着皇权对部落大人世袭权力的全面胜利,但其间的矛盾在北魏时期又演化为皇权与鲜卑贵族的权力争夺,鲜卑代国时期的“新旧”冲突转变成汉族世家大族与鲜卑贵族之间的斗争,极大的影响了北魏前期的政治。

从鲜卑代国亡而复兴的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拓跋族首领所具有的汉文化素养在鲜卑代国成长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什翼犍重建代国,重用幽并士人,用汉文典籍教育子弟,是因为他曾到过中原,受过汉文化的熏陶;拓跋珪所以能完成其祖先未能实现的大业,亦由于他曾流落中原,接触过汉文明。他们的活动不仅影响了拓跋政权的成长过程,也促进了鲜卑人的汉化。事实上,北魏建立以后,政权的演变及鲜卑人的汉化,很大程度上仍受拓跋君主汉文化素养的制约。

鲜卑代国的建立和成长实质上是拓跋鲜卑汉化的起点,幽并边地士人在其中起了文化中介的作用。随着拓跋政权向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转变,幽并士人已难满足拓跋政权对文化人才的需要,因而拓跋珪需在后燕俘虏中拔擢士人后,才足以充实政权发展急需的“宪章”。如果把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的历史进程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由于拓跋鲜卑没有把握住历史提供的机遇,吸引更多的汉族士人,只能仰赖寥寥几个幽并边地士人,使其汉化进程大大慢于慕容鲜卑。

鲜卑慕容部与拓跋部同源异流。慕容涉归迁居辽东,“渐慕诸夏之风”,时当拓跋力微后期。涉归子慕容廆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9年)迁居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见于《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西晋末,廆受愍帝晋镇东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封号,并听从晋征虏将军鲁昌的建议,奉表劝司马睿即帝位,接受东晋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的名号,为其招徕中原士族人士创造了条件。史称:“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乃立郡以统流人。……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羨、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7](卷108,慕容廆载记)慕容部因此蒸蒸日上,逐高丽,兼并鲜卑段部及宇文部,全据辽东辽西,后又趁石赵衰亡之机,入主中原。

在中原世族人的影响下,慕容鲜卑迅速汉化。慕容皝后世均有文采,如其子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现,考试优劣。皝雅好文

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胥子”^[7](卷109,慕容皝载记)。仅从慕容鲜卑上层人物名字变化即可见其汉化之速。慕容廆字奕落瑰,其曾祖莫护跋、祖木延、父涉归,显均系鲜卑名。慕容廆子翰字元老、皝字元真;皝子俊字宣英、恪字玄恭、德字玄明,无疑均为汉名汉字。慕容皝第五子垂本名霸,字道业,勇猛善战,为其兄俊所忌,俊即王位后,以其缺齿,遂伪托春秋晋名臣卻缺之名,改其名为“缺”,后又以该字见于谶记,遂名之为“垂”^[7](卷123,慕容垂载记)。从慕容垂得名始末,可知慕容鲜卑上层人物在辽东时已按汉族方式命名取字,且其名字颇有信道气息。慕容垂字道业,其子宝字道佑、熙字道文,宝子盛字道运,祖孙三代字中均有“道”,其为道教徒更属无疑^①。慕容俊攻灭后赵,立即迁都邺城,未见来自本族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亦可知其时慕容鲜卑汉化已相当深入。

拓跋珪称帝,较慕容俊称帝晚了近半个世纪,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较慕容俊迁都邺城则晚了近一个半世纪。慕容鲜卑打着晋室旗号,收罗流亡的中原士人,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使其进入中原时,无需担心来自汉族世家大族的反抗,这是慕容部能较拓跋部早日进入中原,全面接受汉文化,并制约鲜卑代国的重要原因。

历史本也给拓跋鲜卑提供了同样的机会。《晋书·刘琨传》: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末,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在官末期,流人稍复。……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进者多奔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当此之时,猗咎、猗卢兄弟虽近在咫尺,却未见有招徕晋人之举。猗卢死后,新旧相争,本已投拓跋部的一些幽并主人复奔刘琨,拓跋鲜卑割断了同晋的一切政治联系,更不可能招纳中原流亡人士,遂使之麇集辽东,或先或后,均为鲜卑慕容部所获。拓跋鲜卑也因此沦为石赵及慕容燕政治上的附庸。当拓跋鲜卑终于以征服者的姿态走进中原时,调整与中原世家大族的关系便成了北魏政权面临的重大问题。

尽管拓跋珪“初拓中原,留心慰纳”,但由于中原“士大夫”与慕容政权长期的政治合作,当后燕严灭亡之时,河北世空大族随慕容残部或再次远奔辽东,或南走青齐,成为北燕与南燕的政治基础,主动投附者只是与后燕对立的原属西燕的臣属,如张济、李先、王宪、屈遵等数人,俱见《魏书》各人本传。未能远徙的河北汉族世家大族人士多不愿与拓跋政权合作。《魏书》卷33《宋隐传》:西河人宋隐祖上三代都在后燕任显职,宋隐本人为后燕尚书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别驾,“太祖平中山,拜隐尚书吏部郎。……屡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许。寻以母丧归列人,既葬,被征,固辞以病,而州郡切以期会,隐乃弃妻子,间行避焉。后匿于长乐之经县,数年而卒。临终谓其子侄等曰:‘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延门户之累耳。’”同书《阇官·仇洛齐传》称:拓跋焘初年,为其宠臣卢鲁元寻访舅氏仇广、仇盆、仇洛齐等人,“是时东方罕有仕者,广、盆皆不乐入平城,洛齐独请行曰:‘我养子,兼人道不全,当为兄弟试祸福也。’乃乘驴诣京。”河北人士视入平城为畏途,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河北世家大族总体上对北魏政权持不合作的态度,北魏初年不得不在河北强行迁徙大族,实施“威制”即武力统治。《魏书》卷35《崔浩传》: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发生严重饥荒,出现迁都原前、后燕旧都邺城的倡议。崔浩反对说:“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之间,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

因此,北魏前期只能依仗鲜卑族“国人”,长期置政治重心于北方“广漠之地”即草原地区,缓慢而曲折地向中原与中原文明趋进,而这已不是本文所能说尽阐释的问题了。

注 释:

① 曹永年先生考证拓跋鲜卑迁居匈奴故地时当檀石槐时期,可以信从。参见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 ② 参见段连勤著《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③ 《魏书》详纪此碑文，表明拓跋祖先有功於晋，自是为了证明北魏后期关于北魏承西晋为华夏正统政权的政治宣传合于历史事实，不过此碑颂词淳古，殆非伪作，所反映的西晋末拓跋部与西晋之间的关系，也应属可信。参周一良《桓帝猗奴穆帝猗卢碑》，《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书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
- ④ 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人物名字祖孙数代不讳“之”，“道”，乃因这两字是道教徒的符号。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参 考 文 献]

- [1]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 [韩]朴汉济. 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A]. 东洋史学会. 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3]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 田余庆.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A]. 东晋门阀政治[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6] 李凭. 道武帝早年经历考. 北魏平城时代[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7]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张 琳)

Grow-up of Xianbei Dai Government & Xianbei Nation's Sinoization

HE De-z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E De-zhang (196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oct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bstract: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was set up by Tuoba-Xianbei nation, almost a century before that, Tuoba had continuously accepted Chinese culture, mainly be influenced by literati from borderland in You and Bing district, what has a torturous process and lays foundation for following Northern Wei's development.

Key words: Tuoba-Xianbei; Dai Government; sinoization; Literati of You and Bing district